

书写平民的历史： 《田家读者自传》的写作与编辑*

黄江军

摘要：书写平民历史是新史学在新中国诞生之初便提出的诉求，《田家读者自传》即是其中的一个产物。这本自传集出版于1942年，由影响较大的基督教刊物《田家半月报》向其读者征求而来，共收录百余篇自传，其作者皆出身农家且籍籍无名。其征集形式与体现的自传观念，均表明《田家读者自传》受到当时自传热的影响。编辑者对此书的定位与期待，呈现史学外部对平民史书写的一种努力；不过，此种努力不完全出于学术观念的影响，亦形成于具体的人事交流中。此书作者群体多属乡村读书人，他们写作自传的背景，并非仅与其教育、阅历有关，还基于其阅读与写作的经验能力。这本自传

* 本文由笔者硕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来。删去此前版本中涉及平民史的学术史、民国时期的自传书写等内容，补充若干新近研究，校核部分史料，并纠正一些谬误表述。拙文聚焦于《田家读者自传》的文本形成过程与编者、作者的书写策略，尝试为阅读史（及书写史）的研究提供一个研究案例。多位老师曾对拙文提出中肯批评，张仲民教授更直接促成此次修改。谨此致谢！拙文疏漏之处尚多，敬请读者赐教。

集,不仅提供了解20世纪上半期中国平民(尤其基督教徒)的部分生命实况的材料,亦呈现传主写作行为的策略与特征。

关键词:《田家半月报》,自传,平民史,写作史

黄江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

我们认为今后历史的动向,至少民众应与英雄豪杰平分天下。

——张雪岩《征集农民自传的原因及目的》(1942年)

—

中国史学向称发达,更有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书写传统。梁启超即谓:“畴昔史家,往往视历史如人物传者然。”^①不过,此种史传传统基本与那些没能“创造历史”的平民无关。新史学在中国诞生之初,即立下书写不限于帝王将相的“平民史”的目标。^②此目标的落实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梁启超虽曾批评中国古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然稍加注意可知,其下笔立传者皆中外豪杰,入民国讲历史研究法,复谓“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主要对象”。^③

平民史书写有不少限制,史料不足是最大障碍。^④此种窘境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9页。汪荣祖谓此为“史传合一”。参见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8页。

^② 王汎森:《晚晴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97—222页。

^③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41—42页。

^④ 梁启超就认为,虽屈原这类“伟大奇特”之人,因“资料太缺乏”亦不当作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50页。

于其后“史料的尽量扩充”的史学认识中得到一定突破。^① 史学之外,同时期相关诸学科亦有此关照,一面表达出“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的诉求,一面搜集整理大量有助于重建此种历史的史料。^② 顾颉刚就曾表示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而歌谣、谚语、戏曲这类“平民文学”正是了解民众生活的“钥匙”。^③ 最近数十年,基于现代史料整理与数据化的迅速推进,公众史学与口述史的兴起,辅以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等相关理论的影响,平民史的书写取得一定进展。^④ 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等研究领域的深入,更为平民史书写提供史料解读的方法论思考。通过史料的批判解读,研究者已自觉注意“史料生产的权力关系”,进而通过知识精英参与生产的文本去捕捉失语的平民的声音。^⑤

本文要讨论的《田家读者自传》,即是民国时期书写平民史诉求的一个产物。这本自传集出版于1942年,汇集了一百余篇“农家子”书写的自传。^⑥ 此书长期淹没于历史中,仅偶被研究现代基

① 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论现象》，《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125页。

② 参见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③ 顾颉刚：《〈民俗〉发刊辞》，《民俗周刊》第1期，1928年3月21日，第2页；《关于〈谜史〉》，《民俗周刊》第23、24期合刊，1928年9月5日，第20页。

④ 相关的学术史回顾与理论检讨，参见徐健芝、许兆麟选编，林德山等译《庶民研究：印度另类历史术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钱茂伟：《平民传记史学价值的多视野观察》，《人文杂志》2015年第8期，第73—79页；焦润明：《论20世纪上半期的民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9—124页。

⑤ 相关议题的理论反思，可参考连玲玲《典范抑或危机？“日常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台北）《新史学》第17卷第4期，2006年12月。研究实例则可见沈松桥《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象》，《新史学》（台北）第20卷第1期，2009年3月；黄江军：《“觉悟”女性的自我书写：以1930年代的〈女子月刊〉为中心》，（香港）《二十一世纪》2017年2月号；及以《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为代表的性别史研究论著。

⑥ 张雪岩、刘龄九编辑：《田家读者自传》，田家社（成都）1942年版。

督教文字事工的论者顺带提及。^① 本文讨论的重点,不在于通过自传文本重建这些平民的生命史,而尝试从阅读史角度考述此书写作与编辑的过程,重建这些自传作者的阅读与写作世界。

二

《田家读者自传》由当时面向乡村发行的《田家半月报》向其读者征集而来,征集广告首次刊登在1940年11月1日的《田家半月报》上。^② 几乎同时,一场由上海各界贤达发起的“现代人自传运动”,则面向都市读书人征集自传。^③ 两者是否存有直接关联尚不得而知,但明显都受到彼时自传热潮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有精英站台、读者知识素养占优的“现代人自传运动”无果而终,《田家读者自传》则得以正式出版。两者命运反差的原因颇值玩味,而《田家半月报》的运作策略及其培植的读者的亲近感无疑是其自传征集成功的重要基础。因此,论述《田家读者自传》的生产过程,即有必要先就《田家半月报》的出版史作一勾勒。^④

① 九三学社潍坊市委员会、政协潍坊市寒亭区委员会编,陈建明主编:《张雪岩传》,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127页;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516页。另有论者著录此书,却误将其编入1912年。参见俞樟华、俞扬编撰《民国元年日志:1912年1月—12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5页。

② 《本报启事:征求读者自传》,《田家半月报》第7卷第22期,1940年11月16日,第18页。

③ 《现代人自传运动缘起》,《青年文会》第2卷第10期,1940年11月,第691页;《现代人自传运动简章》,第694页。关于《青年文会》办刊的简短介绍,参见吴俊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6页。

④ 此前对《田家半月报》的研究,参见陈建明、刘路《中国基督教传媒领袖张雪岩与〈田家半月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陈建明:《基督教信仰与乡村教育理念的融合:〈田家半月报〉评析》,《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4期;王京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田家半月报〉与乡村建设》,《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

《田家半月报》由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编辑发行，于1934年8月1日在济南齐鲁大学创刊，主编者先后有孙恩三、张雪岩、刘龄九等人。1931年10月，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召开组织会，农村文字事业即是其讨论重点之一。会议决定设立文字部，出版刊物，孙恩三任该部主任，“文字部办公地点请孙恩三先生于最近五个月内亲往各地观察报告本委员会再行决定”。^①孙恩三与张雪岩于1934年4月最终选定在齐鲁大学成立田家社。张雪岩回忆，此一选址基于如下考虑：

（一）负责出版的机关“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既属华北，刊物出版，当然应在华北；（二）华北语言，大体一致，以通俗国语为文字标准，在华北易于进行；（三）齐鲁大学有规模可观的图书馆，可供利用，有龙山农村服务部可供考查并取材，有农场可以介绍农业科学知识并解答农业实际问题，有驰名全国的医学院，能获得卫生医药方面的帮助，……最重要的是校内有神学院，对宗教材料，自然可以有贡献；（四）与齐大农场合作的华洋义赈会可贷款建造房舍；（五）济南交通方便，寄递不感困难；（六）济南印刷校内校外都有。^②

孙恩三等人定位十分清楚，充分利用齐鲁大学解决农民问题的丰富资源以及华北地区开展多年乡村建设运动的有利局面。

这份杂志的英文名为 *The Christian Farmer*，试刊号的栏目包括天下大事、言论、常识、文艺、宗教、生计副刊、卫生副刊、家事副刊、儿童副刊等，每期约20页。此后虽历经战乱，篇幅时有削减，格局

^① 《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组织会会议记录与简章》（1931年10月17日—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29，第1—4页。

^② 张雪岩：《田家瞻望》，田家社（成都）1942年版，第9—10页。

却基本没有变化。这些内容涉及事件消息、现代知识、乡村建设以及基督福音。从试刊号的《田家半月报的希望》也可看到,编者试图在如上方面改造农民,而“田家就是种田的人家,田家半月报就是种田人家看的报”。^①当时,定位面向平民的期刊并不少见。例如1933年《女子月刊》创办人黄心勉就试图另办一个“专给一般女工农妇和娘姨看”的妇女刊物。^②占据人口多数的农民,自然是基督教会的潜在信徒,教会也早已意识到通过文字影响他们归主的可能性。1925年,上海广学会就创办过供平民阅读的通俗读物《平民月刊》,其结构与《田家半月报》类似,但并不专注农村。不过,此类尝试不是没有实现,就是影响远不及《田家半月报》。

上海市档案馆藏《田家半月报》试刊号第3、4页间,夹带有用英文打印的《田家半月报》计划书。这份文献或出自孙恩三之手,提供了《田家半月报》最直接的创刊背景。文中提到,数年来教会领导人深感有必要发行针对乡村地区的基督教刊物,据估计,当时至少有十万新的识字或半识字的农村教友。因此,该报将以下三类群体视为“预期读者”:

- (1) 阅读福音书没有太大困难的教会中人;
- (2) 参加过为成人开设的识字班或类似学校的人;
- (3) 广大的乡村知识人(the general rural literate public)。

为能让“种田的人”读懂这份报纸,文中提到,《田家半月报》尽量选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农民千字课》的基本字,超出的字也全部从福音书中选择,所有的文章都用最通俗的白话(vernacular)写或译。^③同时,报纸要求图文并茂,并在每页对较难

^① 《田家半月报的希望》,《田家半月报》第1卷第1期,1934年8月1日,第1页。

^② 黄心勉:《我们的希望》,《女子月刊》第1卷第8期,1933年10月15日,第8页。

^③ Prospectus of *The Christian Farmer*,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99,第1页。

的字注音，与《千字课》教材极为相似。^①《田家半月报》还专门登载注音字母表，讲授拼字方法，“望会的读者教教不会的”。^②

《田家半月报》虽是基督教刊物，“以文字布道，是本报的中心目的”，但宗教内容不到五分之一的篇幅，且强调宗教生活化的一面，这使得该报也能赢得非教徒读者的关注。^③编者亦颇能根据农时适时在各期登文指导当月农业生产，及有针对性解决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等。^④诸如《播种的法子》《多大年纪能生聪明孩子》一类的文章，因其浅显易懂而颇能引起读者兴趣。^⑤

编辑者尤其注重培养读者对报纸的亲近感，几乎每期都会登载读者的来信，其中多数是押韵的白话诗。随举一条“河南正阳农民陈希圣”的《读报感言》：

田家报，称至宝，利我农民真不少；
谈治家，讲真道，真是农民传家宝；
真奇妙，真正好，天下大事详指导；
劝同胞，莫忘掉，节省点钱订此报。^⑥

类似诗歌多不胜数，基本意思大同小异（赞扬报纸内容，邀请读者订阅），不追求高明的文学效果，却颇为押韵而易于理解，也比较能

① 张雪岩曾谓《田家半月报》的畅销原因之一，是“乡村小学教员学生多以此为课外读物，并向亲友自动介绍”。张雪岩：《田家瞻望》，第14页。

② 《注音字母表》，《田家半月报》第1卷第9期，1934年12月1日，第23页。

③ 张雪岩：《田家瞻望》，第30—31页。

④ 从1935年第2卷第1期开始，该报封面即是当月二十四节气的预告。该报登载的医疗卫生文章，则汇集于张雪岩、刘龄九编辑《田家医药指南》，田家社（成都）1942年版。

⑤ 参见《田家半月报》第2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第18页；第2卷第7期，1935年4月1日，第10—11页。

⑥ 陈希圣：《读报感言》，《田家半月报》第7卷第15、16期合刊，1940年8月16日，第6页。

体现读者的喜爱之情与知识水平。

《田家半月报》的发行主要借助基督教会的网络。与此同时，该报也在其他刊物登载各种形式的广告。^①张雪岩回忆，该报初期“印了一万份，然后按照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乡村教会通讯簿邮寄数份”。^②据《田家半月报》统计，发行5个月时，正式订报的读者来自20个省，“数目将近五千”；又经过两个月，订户已过6000。^③这仅仅是订户，实际阅读者势必超过这一数字。一位河北的读者就来信说，“我们村里虽然定了不过四份，但真正看报的，却有二十多人”。^④有读者不识字，自己出钱订，而请人念来听。^⑤到发行三周年时，《田家半月报》已拥有“三万以上的(定)[订]户，几十万以上的读者”，当时的编者孙恩三甚至表示到四周年时，要使订户达到10万(即前揭最初估算的预期读者数)，而“根据最近调查，本报每一定户，至少代表十个读者，那么十万定户，就是一百万读者”。^⑥

这里的数字未必确实，但孙恩三的乐观估计可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评价中得到印证。1937年7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会在青岛召开，会议注意到基督教文字事工“最大的弱点就是销数”。报刊销量上不去，读者自然就少，也谈不上吸纳信徒。据分析，教会刊物在销量上失败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

① 例如《大家节望多年的基督教农民刊物田家半月报出版》，《中华归主》第148期，1934年9月1日，第7页；《公报》第7卷第2期，1935年3月10日，第4—6页；邹伯咏：《田家半月刊》，《消息》第8卷第9期，1935年，第30—31页；《介绍：田家半月刊》，《平民月刊》第12卷第3期，1936年3月，第28页。

② 张雪岩：《田家瞻望》，第11页。

③ 《恭喜新年》，《田家半月报》第2卷第1期，第2页；《和读者谈谈本报的家常》，《田家半月报》第2卷第5期，1935年3月1日，第9页。

④ 《两封读者的来信》，《田家半月报》第2卷第7期，第7页。

⑤ 《和读者谈谈本报的家常》，《田家半月报》第2卷第5期，第8—9页。

⑥ 孙恩三：《从本报三周年纪念说到本报十万运动》，《田家半月报》第4卷第15期，1937年8月1日，第2页。又见同期《本报启示》，第32页。

(一) 定价过高,超出人民经济能力之上。(二) 教会人数太少,能力薄弱,不能有多量的购订。(三) 文字内容不甚合宜,与一般读者的生活上不能有好大关系。(四) 刊物的形式不美观。(五) 关于推销方面,无训练,无组织。(六) 许多人对于宗教方面的著述不甚留意。^①

《田家半月报》当然也面对同样的困境,但通过前述努力已经克服不少。该会统计,“教会发行的书平均每百页售价一角六分,教外发行的书平均每百页售价仅六分”,同时乡村读者订阅教会刊物,每人每年平均花费三角四分,城市读者则平均七角四分。^② 而反观当时的《田家半月报》,全年 24 期超过 480 页,定价仅为四角,每百页售价仅为八分三厘,几乎是教会刊物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乡村读者的平均购买力大致可以定购全年的《田家半月报》。因之,《田家半月报》借助以上“地利人和”的发行技术,异军突起成为教会刊物乃至平民期刊界的“后起之秀”,受到文字事工委员会的肯定。^③

不过,孙恩三的乐观不久就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破灭。

^①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议会议录》(1937 年 7 月 15—29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U102-0-12,第 178 页。

^② 同上。

^③ 张雪岩亦曾总结过该报销行迅速的原因:“(一) 文字浅显,人人能懂。(二) 材料丰富,切合农友需要。(三) 出版迅速,发行敏捷。(四) 定价低廉,不论穷富,都可订阅。(五) 乡村布道同工,多自动代为推销介绍。(六) 乡村小学教员学生多以此为课外读物,并向亲友自动介绍。(七) 同情乡村文字运动的知识阶级及外国宣教士常为别人代定,藉事提倡。”(张雪岩:《田家瞻望》,第 14 页)张雪岩进一步于同书专章讲述田家的运作“技术”,包括通俗、插图、征文、问答、实际服务、宣传与奖学金等项。(同上书,第 40—52 页)《公报》曾评价:“《田家》为教报后起之秀,销行颇广,如能继续展进,大有不胫而走之风。”(《张孙两君分途出国留学》,《公报》第 7 卷第 4 期,1935 年 7 月 10 日,第 20 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文字事工委员会对该报的肯定,参见《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议会议录》(1937 年 7 月 15—29 日),第 179 页。

《田家半月报》的篇幅随即因战时纸张紧缺而压缩成12页，“只把重要的消息和最要紧的常识等登载出来”。^①稍后，田家社副总编辑张雪岩赴美留学。1937年9月底，日军攻入山东，编辑刘龄九乃与15岁的小工友一起将田家社南迁长沙（文昌阁六十六号）。为节省纸张，“言论”栏登在了封面，篇幅再度减为8页。^②1938年10月，刘龄九只身入川，将田家社迁到成都（四圣祠北街二十号），同时会合来蓉的齐鲁大学，决定在“人力财力多样困难”中“恢复原来的形式”。^③刘龄九后来称，在长沙的一年，“是本报生命中最平淡的一年，但却是田家工作中最艰苦的一年”，订户由4万锐减至3000。^④

抗战内迁后的成都，聚集了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知名教会学校，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临时委员会亦在该地建立起来。此时期的中华基督教会重点开展了边疆服务的工作，并迎来“基督教本色化”的重要时期。^⑤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正是此时，留学归来的张雪岩不仅继续主持《田家半月报》的编辑工作，还主编《公报》，并进入中华基督教会高层，其后成为中国基督教界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⑥也正是依靠这种聚合的力量，原南京金陵神学院主办的小报《农友》并入《田家半月报》出版。^⑦田家报华西

① 《紧急时期中的本报》，《田家半月报》第4卷第16期，1937年8月15日，第2页。

② 孙恩三：《救国与救灾》，《田家半月报》第4卷第23期，1937年12月1日，封面页。

③ 《本报启示》，《田家半月报》第5卷第23期，1938年12月1日，第20页。

④ 刘龄九：《“七七”事变后的〈田家〉》，《田家半月报》第7卷第15、16期合刊，第11—12页。

⑤ 参见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⑥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临时委员会筹备会议记录》《总会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重要决议案》，《公报》第14卷第1、2期合刊，1942年2月，第12—13页。

⑦ 《〈农友〉并入本杂志喜》，《田家半月报》第6卷第6期，1939年3月16日，第2页。

临时理事部更囊括了圣公会、浸礼会、公谊会、美以美会、中华基督教会、长老会、金陵神学会以及四川基督教协进会等基督教会。^①此外，田家社还联合迁蓉的基督教出版机构青年协会书局、华英书局、广学会等，于1943年发行季刊《基督教丛刊》。前述教会网络的组建，无疑提升了《田家半月报》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刚入成都的《田家半月报》销量降到2000，1939年底回升至6000。^②1940年8月六周年时订户达7863位，覆盖18个省。^③其中四川地区的订户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各县均有订户，多者逾百份，少者一二份，陕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贵州、云南等次之，大致与成都距离的远近相关。^④至1940年底，订户达12500位。^⑤一幅统计图显示，1939年1月至1940年12月，每月都新增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至两千多位不等的订户。^⑥目前可知最后一份田家订户统计的资料来自1941年底，为38016户。^⑦虽历经艰难，《田家半月报》的销量还是逐渐恢复到战前水平。局面的好转，促使张雪岩宣示田家社1941年的三大愿望：《田家半月报》达

① 张雪岩：《田家瞻望》，第20页。

② 《言论：二十八年在成都》，《田家半月报》第7卷第1期，1940年1月1日，第2页。

③ 《本报分布各省图》，《田家半月报》第7卷第15、16期合刊，1940年8月16日，封面页。

④ 《四川本报读者分布各县图》，《田家半月报》第7卷第17期，1940年9月1日，第7页。

⑤ 《两幅统计图：田家半月报五年定户比较图》，《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3期，1941年2月1日，第19页。该图显示其他历年订户数为：1936年25925户、1937年42043户、1938年3212户、1939年5401户。

⑥ 《两幅统计图：田家半月报两年来每月新增定户比较图》，《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3期，1941年2月1日，第19页。

⑦ 《在四川成都销行分布图》（1941年12月制），《田家瞻望》，第62页。另有估计1946—1947年，全国大约有75万人读过田家，60%为农民。参陈建明《基督教信仰与乡村教育理念的融合：〈田家半月报〉评析》，《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4期，第66页。

5万订户、设立田家奖学基金与出版《田家读者自传》。^①

三

1940年初,发行量平稳回升中的《田家半月报》宣布恢复抗战以来中止的征文。^②当时通过主题征文加强与读者的互动是报刊的普遍做法,田家亦如是。1940年11月1日,《田家半月报》正式刊发《征求读者履历》的启事。编者言:“本报为求进步,觉得有必要对读者的年龄、职业、性别、教育程度及宗教信仰等都有清楚了解,方能写出大家需要的文章,编选于大家有益的材料。”编者设计了10个项目,希望读者“清楚填答”,“千别胡说”。^③应该说这次并不算征求读者自传,而是对读者基本情况所作的调查,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读者,以便于为其提供更为合适的报刊内容。

然紧接的一期,“履历”变成“自传”,目的在“对读者有更清楚的了解”外,还“使读者彼此间有真切的认识”,编者明确称之为“‘征求读者自传’运动”。^④无法确知征稿内容为何出现转变,亦无法断定其与同时的“现代人自传运动”是否有直接关联。不过,正如前所述,两者均孕育于当时的自传风气中,并可能进一步反哺此风气。下面的现象或可印证《田家半月报》与此前的传记热高度相关。

从1936年初开始,《田家半月报》设立传记栏目,介绍当代国内外名人。直至1940年10月,该报在四年半的时间里陆续刊登

① 《本年的新希望》,《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第20页。

② 《重要启事:征文》,《田家半月报》第7卷第1期,1940年1月1日,第20页。

③ 《本报启事:征求读者履历》,《田家半月报》第7卷第21期,1940年11月1日,第16页。

④ 同上书,第17页。

了约 68 位名人传记,其中包括 62 位中国军政文化界知名人士,6 位英、法、德、苏、美国家元首。(见表 1)这些材料极可能是从其他刊物或当时各类名人传记转载加工而来,并成为读者喜爱的内容。有读者就道:“田家半月报,编得真正好,上有名人传,还有小医院。”^①

表 1 《田家半月报》登载名人传记目次

专辑栏目	传记者	卷期	出版时间	页码
国内名人传略	未知	卷 3 期 1	1936 年 1 月 1 日	未知
国内名人传略 (续)	汪兆铭、蒋中正	卷 3 期 2	1936 年 1 月 15 日	页 10
国内名人传略 (续)	冯玉祥、翁文灏	卷 3 期 3	1936 年 2 月 1 日	页 10
国内名人传略 (续)	张嘉璈、钮永建	卷 3 期 10	1936 年 5 月 15 日	页 10
国内名人传略 (续)	邵元冲、丁惟汾	卷 3 期 12	1936 年 6 月 15 日	页 10
国内名人传略 (续)	李宗仁、陈济棠	卷 3 期 13	1936 年 7 月 1 日	页 11
国内名人传略 (续)	许世英、郭泰祺	卷 3 期 21	1936 年 11 月 1 日	页 10
国内名人传略 (续)	阎锡山	卷 3 期 23	1936 年 12 月 1 日	页 11

^① 巨艾民:《快订田家半月报》,《田家半月报》第 3 卷第 21 期,1936 年 11 月 1 日,第 11 页。

(续 表)

专辑栏目	传记者	卷期	出版时间	页码
国内名人传略 (续)	商震、冯治安	卷3期24	1936年12月 15日	页15
国内名人传略 (续)	蒋鼎文、黄绍雄	卷4期1	1937年1月 1日	页14
国内名人传略 (续)	于学忠、熊式辉	卷4期2	1937年1月 15日	页11
国内名人传略 (续)	宋子文、杨虎城	卷4期3	1937年2月 1日	页10
国内名人传略 (续)	刘峙、顾祝同	卷4期4	1937年2月 15日	页10
国内名人传略 (续)	李烈钧、陈诚	卷4期5	1937年3月 1日	页10
国内名人传略 (续)	程潜、唐生智	卷4期6	1937年3月 15日	页9
国内名人传略 (续)	邵力子、吴稚晖	卷4期7	1937年4月 1日	页9
国内名人传略 (续)	陈调元、钱大钧	卷4期8	1937年4月 15日	页9
国内名人传略 (续)	蒋方震、张发奎	卷4期9	1937年5月 1日	页9
名人传(续)	贺耀祖、马鸿逵	卷4期10	1937年5月 15日	页9
名人传(续)	蔡元培、马相伯	卷4期11	1937年6月 1日	页9

(续 表)

专辑栏目	传 记 者	卷 期	出版时间	页码
名人传(续)	刘尚清、朱绍良	卷4期12	1937年6月 15日	页9
名人传(续)	何键、何成浚	卷4期13	1937年7月 1日	页9
名人传(续)	秦德纯、张自忠	卷4期14	1937年7月 15日	页9
名人传(续)	李济琛、陈铭枢	卷4期15	1937年8月 1日	页13
名人传(续)	俞鸿钧、张治中	卷4期17	1937年9月 1日	页9
名人传(续)	黄梅兴、梁鸿云	卷4期19	1937年10月 1日	页8
国内名人介绍	孙连仲	卷5期23	1938年12月 1日	页7
国内名人介绍	宋庆龄	卷5期24	1938年12月 15日	页7
名人传记	何香凝	卷6期4	1939年2月 16日	页8
名人传记	庞炳勋	卷6期6	1939年3月 16日	页8
名人传记	张伯苓	卷6期7	1939年4月 1日	页8
名人传记	张之江	卷6期8	1939年4月 16日	页7

(续表)

专辑栏目	传记者	卷期	出版时间	页码
传记	盛世才	卷6期9	1939年5月1日	页7
传记	邓锡侯	卷6期10	1939年5月16日	页7
传记	李汉魂	卷6期11	1939年6月1日	页7
传记	叶恭绰	卷6期12	1939年6月16日	页7
传记	吉星文	卷6期13	1939年7月1日	页7
名人介绍	张伯伦	卷6期23	1939年12月1日	页8
名人传	法总理达拉第	卷7期1	1940年1月1日	页8
名人传	德元首希特拉	卷7期3	1940年2月1日	页8
名人传	斯大林	卷7期7	1940年4月1日	页7
名人介绍	丘吉尔	卷7期11	1940年6月1日	页7
名人传记	罗斯福	卷7期19	1940年10月1日	页7

注：根据《田家半月报》各期整理，共计约68位。由于卷3期1已经遗失，无法得知当期介绍的名人以及设立名人传记栏目的可能动机。从此前各期均无该栏目，且紧接着的第二期为“国内名人传略(续)”，可断定名人传记是从卷3期1开始的。由于此后各期基本介绍两人，此期介绍的名人亦估算为两人。

《田家半月报》征集自传的对象“不论男女”，自己不能写的可找人帮忙。张雪岩后来提到：

关于本书征集的方法，倒是一个有趣问题，即由本报（田家半月报）刊登征稿启事后，不出十日，即有作品寄来，不过这种速成作品，都不成为传记，因为“自传”对他们是陌生名词，也许不曾正式写过文章，体裁不晓，章法更说不到，同时又热情响应我们的启事，于是本了本报第七卷第二十三期（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征稿启事中的自传写法和原则逐条简单填写。^①

此处前一个“征稿启事”即指第7卷第21期的《征求读者履历》。读者依样画葫芦，据此投来的均是些“填表式的稿件”。^②张雪岩发现，“自传”对大部分农民而言是“陌生名词”，他们多半连一般散文都没有写过，更谈不上写自传。为能让读者写出编者满意的自传，第7卷第22期的启事（张雪岩误作23期）同时提及“自传的写法”。编者谓，自传的写法，“自然不能一样”，又按家庭情况与年龄段列出自传的必备要素，如“儿童时代的趣事，特别是影响你处世为人的人物和事件”，“成人时期的种种，如对事业的兴趣及儿女的感情等”。启事同时提醒自传写作的几条原则，如句句真实、选材生动、表述连贯。^③启事所列自传基本内容与写作原则，与当时传记写作的一般方法接近。^④编者心中的理想自传其实遵

① 张雪岩：《编者序》（1942年5月10日），《田家读者自传》，第26—27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③ 《本报启事：征求读者自传》，《田家半月报》第7卷第22期，第17页。

④ 如此前专门论述传记写作的文章就提及，传记写作“要有系统的程序”：“传记的叙述程序，至多不过大同小异。大抵首先是关于所传的人的出身，早年的时代社会及其他一切环境，因为这些环境，是必然地在他的生活思想和性格起着极大的（转下页）”

循比较通行的一套写法。

前已提及,编辑出版《田家读者自传》是《田家半月报》1941年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因此,《田家半月报》几乎每期都会提到自传征集的进度,据此可大致了解征稿的过程。三个月时编辑部已收到一百余篇自传,^①再一月则达二百多篇,编者鼓励“已下笔的快写成寄来,没有写的,放心大胆的写,只要把你个人的生活和家庭状况实实在在的写出来,就是好传记”;可能有读者节约纸张,编者提醒不要两面写,“以便粘存”。^②

1941年8月1日出版的《田家半月报》首次刊登了《田家读者自传》的预约启事。启事显示当时预计选200篇,强调装订印刷精美,有名人序言,文章可读性强,又暗示投送自传的作者“多买几本”,以便读者以及识字的农友“人手一册”。^③之后各期均有此书预约启事,同时还发布有《田家卫生指南》(两册,后改题为《田家医药指南》出版)、《田家的过去与未来》(后改题为《田家瞻望》出版)两书的广告。编者提示,如果未受空袭影响,自传可在10月底出版。然时事并不顺利,到11月时编者又称12月底可出版,复因“纸价突涨”,原预约价一元五角停止,恢复原价二元订购。^④11月16日《田家半月报》启事谓,前述三书“均在付印中”,但“恐不能按

(接上页)作用。……早年的交游,不消说是有影响于人的生活 and 事业,种种的特殊机会,也同样地必须指明。其次最可令人注意的,是关于他的修养与准备方面。再次是叙述他的严正的工作时代的重要节目。最后是关于他的死亡及写作者因他而抽引出来的结论。而在这些叙述的过程之中,最要注意怎样从所传者的各个时期中摄取真实而且精当的材料,尤其是富有特色和新的趣味的材料,还要注意怎样避免着事实之单纯的罗列,而努力于作者主观的抒发。”(《怎样写传记》,新缘文学社编:《名家传记》,文艺书局1934年版,第7—8页)该文转载自某报附刊,多少说明其有所流行。

① 《本报启事》,《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6期,1941年3月16日,第20页。

② 《本报启事》,《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8期,1941年4月16日,第20页。

③ 《预约启事:田家读者自传》,《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15、16期合刊,1941年8月1日,第24页。

④ 《新书不日出版》,《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21期,1941年11月1日,第20页。

预订之期出版”。^① 出版日期一拖再拖，编辑只能不断向读者致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物价腾贵，期刊无奈上调定价，编辑在细致地解释后，承诺“已预约的书，无论如何困难，不再加价”，“三书约二月间方能全部出齐”。^② 紧接一期公布了新定价格，《田家读者自传》为五元，“至于原定的预约价，本来声明不再加价，但因受了本报印刷费的大影响，实在没法实践约言了。……凡预约书的人，要价均按实价（新订价目）八折优待。……如果有人以为太贵，可以示知，本社即将预约书费如数退回。但能谅解我们的朋友，请即将应补书款算好寄下，二月下旬即可寄书”。^③ 按照新定价目，先前预约者须再行支付二元五角。二月下旬实仅出版《田家瞻望》、《田家医药指南》（上册）。

自传一再延期与提价，以及《田家半月报》压缩篇幅，引起一些读者的不满：来自“南阳赊镇长春街”的读者批评田家“不讲信用”，一位“绥远临河”的读者指田家为“骗子”。^④ 当然，也有读者表示体谅。^⑤ 这些批评与回护的声音能够登在《田家半月报》上，自能表明编者忏悔的精神，却也体现其运作刊物的智慧。^⑥

《田家读者自传》最终于1942年7月正式出版，《田家医药指南》（下册）亦于8月出版。9月1日的《田家半月报》刊出《田家

① 《本报启事》，《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22期，1941年11月16日，第20页。

② 《重要启事》，《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24期，1941年12月16日，第19—20页。

③ 《重要启事》，《田家半月报》第9卷第1期，1942年1月1日，第16页。

④ 《不讲信用》，《田家半月报》第9卷第9、10期合刊，1942年5月1日，第19页；《全国读者的骗子们》，《田家半月报》第9卷第16、17期合刊，1942年8月1日，第22页。

⑤ 徐建甫：《寄给责难田家的朋友的一封公开信》，《田家半月报》第9卷第13、14期合刊，1942年7月1日，第18页。

⑥ 编者谓，把临河读者的信注销来，“作为本报八周年中之一纪念，并作为对全国读者的一点忏悔”。《田家半月报》第9卷第16、17期合刊，1942年8月1日，第22页。

读者自传》首则售书广告：

本书系从代表十六省的三百多位读者的自传中编辑而成。本书的作者，几全系农家子，穷苦汉，且有多人曾经作过乞儿，当过奴仆，在这本平淡无奇的书中可以找出人生奋斗成功的秘诀，可以看出中国乡村建设的途径，乡下同胞，人人固该读，关心民众福利的时贤志士尤应购买一册。内有当代学者顾颉刚、李安宅、杨导之诸先生著的长序，及统计图六幅，全书定价十元。^①

今日所见前述三书的版权页，都没有标示价格，只有“国币 元”的字样。此时《田家读者自传》的售价，已升至 10 元，乃应付物价腾贵的无奈之举。借助前述教会聚合的机会，同样的广告也出现在《公报》以及一年后的《基督教丛刊》中，前者多了“不但是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是个案心理的研究。故社会学界的专家和学生，更应购置而作参考”一句，^②后者多了“研究个案、心理，及社会环境的学者，更应购买”一句，并定价为 20 元。^③

四

这本《田家读者自传》，算上封皮共 446 页。^④ 封面有“田家从

① 《新书出版：田家读者自传》，《田家半月报》第 9 卷第 17、18 期合刊，1942 年 9 月 1 日，第 23 页。

② 《新书介绍：田家读者自传》，《公报》第 14 卷第 7、8、9、10 期合刊，1942 年，第 40 页。

③ 《本社介绍书报广告：田家读者自传》，《基督教丛刊》第 2 期，1943 年 7 月 1 日，无页码。

④ 其中页码 71—80 重出，应是排印错误。以下引第二次页 71—80 的内容时，标记为第 71(2)—80(2) 页。

书”“田家读者自传”“田家出版社”十五字，并有山东著名画家夏省吾绘的一幅图像：包括笔墨纸砚，只是执笔的老者颇显清瘦，表达出绘画人心中的农民形象。扉页印“谨献给：关心乡村问题的朋友们；参加乡建运动的同志们”，此紧密呼应《田家半月报》关心的主题。开篇是顾颉刚、杨开道、李安宅三位学者以及张雪岩分别撰写的4篇序言，6幅作者信息统计图，正文是按作者出生地分省编排的104篇自述，最后是刘龄九撰写的“编后的话”。这本书将文人与平民的形象、文字熔为一炉，除了前述作为物质文本的书籍的生产以外，哪些因素又促成了文字文本本身的形成？售书广告中提到的“农家子”甚至“乞儿”又如何创作自传？究竟谁写出了这些文本？而当时编者、作者们自觉的文本意义又如何呢？

因自传原稿未见，无法确知编辑中的改动，以及究竟哪些稿子被筛掉。不过，刘龄九提及，编辑过程中基本只改正错字、标点字句。^①看过部分原稿的李安宅也称“文字只有删减，没有修饰”。^②结合自传文字来看，两人的话应该可信。这些排印出来的自传大体可以反映原稿样貌。

顾颉刚等人并非纯粹的学院派文人，其实均有眼光向下的关怀。抗战内迁，使得这批有着共同关怀的学者聚合起来。顾颉刚自不必论，其1939年9月到成都，就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而田家社正依托于齐鲁大学；杨开道曾留美学习农村社会学，颇为关注农村问题，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安宅与杨有类似经历，归国后即任教于燕大，时任教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此时多所教会大学汇聚成都，借当地大学校舍而立，加以学人旧时的交游（三人均曾供职燕大），创造出难得的学术交流空间。钱穆就在

① 刘龄九：《编后的话》，《田家读者自传》，第1页。

② 李安宅：《序》（三），《田家读者自传》，第12页。

《师友杂忆》中不止一次提到“光阴悠闲”之类的话，并提及各校学人互动交流的生动片段。^① 顾氏日记，更是详尽记录了那时学人在成都的生活场景。

《顾颉刚日记》首次提到张雪岩等人是在 1940 年 10 月 20 日：

五时许到四圣祠边疆服务部，留宿，由冠一招待吃饭。

与冠一、熊自明、张雪岩、刘龄九等谈。失眠，服药。

今晚同席：刘龄九、张雪岩、许纶初、熊自明、边疆服务部及《田家半月刊》同人林冠一。^②

此时，田家社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均设址于四圣祠，而热衷于边疆研究的顾颉刚可能在此前已听闻田家社或结识张雪岩等人。^③ 正是通过这些关联，顾开始注意田家，四天后，顾在日记中记，晚间“出席史社迎新会。与伯怀、雪岩同步归”。^④ 之后复同田家社诸人屡有接触，顾颉刚还听过张雪岩的演讲。^⑤ 顾氏受邀为这本自传集作序于情理可知。顾颉刚所写序言近 9 页，落款时间是 1942 年 3 月 9 日。^⑥ 实际上，顾颉刚在前一天下午就“略草《田家读者自传》序”；九日“晨二时即起，为《田家读者自传》作序，至六时天明作讫，约四千言”，下午又“修改今晨所作文”。之所以

①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220—246 页。

② 《顾颉刚日记》，1940 年 10 月 20 日，《顾颉刚全集》第 47 册，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440 页。

③ 1940 年，顾颉刚应边疆服务部负责人张伯怀邀作《边疆服务团团歌》；1941 年 2 月，顾颉刚参与发起中国边疆学会并撰学会《宣言》。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43—350 页。

④ 《顾颉刚日记》，1940 年 10 月 24 日，《顾颉刚全集》第 47 册，第 442 页。

⑤ 《顾颉刚日记》，1940 年 12 月 2 日，《顾颉刚全集》第 47 册，第 455 页。

⑥ 顾颉刚：《序》（一），《田家读者自传》，第 9 页。

半夜起床作文，乃因顾当天上午需返城，十一日则要去重庆，其谓“深宵静寂，四小时竟抵得到一天工作”。第二天，顾颉刚“写张雪岩信。修改《田家读者自传》序讫”，并谓“论文只费三天功夫，自喜精力尚不衰颓也”。^①看起来有些赶，却显示其并非随意为之的认真态度。

杨开道、李安宅虽没有日记可供查考，但甚为关注乡村的他们应是在类似场合与田家结识。张雪岩自然知道这些人的眼光，称“这三位都是知名学者，同时都是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先进”，^②实非溢美之词。因此，除杨开道序言较短，着重讲述其阅读自传的感受外，诸人表述的理念非常集中——给民众表达的机会！不过，在他们彼此相同的关怀外，此种共同的观点尚有较隐秘的形成过程。

张雪岩在序言中交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平民写作的困难及征集农民自传的背景，其二是征集农民自传的目的，其三是征集方法与过程。前两者经过缩减，以《征集农民自传的原因及目的》为题发表于另一个期刊。^③张雪岩指出，过去“文章被特殊阶级所垄断”，因此史书中基本没有平民的地位。^④而近年“普罗”“大众”的口号虽然很响亮，但所谓“平民文学”平民却看不懂，根本只是“洋八股”；此外，出版界唯利是图，不支持“平民写作”，都导致平民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⑤在张雪岩的论述中，田家一直“训练读者写作”，包括“读者园地”“问答”都是一些机会，而征集

^① 《顾颉刚日记》，1942年3月8日、9日、10日，《顾颉刚全集》第47册，第650—651页。

^② 张雪岩：《编者序》，《田家读者自传》，第30页。

^③ 张雪岩：《征集农民自传的原因及目的》，《读书通讯》第56期，1942年12月16日，第10—11页。

^④ 张雪岩：《编者序》，《田家读者自传》，第17页。

^⑤ 同上书，第18—20页。

自传也是一种训练。

前掲自传征集启事表述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民众”，此处则系统化为三个目的：第一，“鼓励读者写作，促进大众写作的自信心”；第二，“引起知识阶级对民众之注意及敬信”；第三，“为民众争取历史地位”。^① 清晰化的过程表明张雪岩等人起初可能并没有刻意去倡导民众写作，但此时附加的这些意义却很能说明“平民”叙事话语在“抗战建国”时期的重要性。张氏在这里陈述的观点，很可能受到顾颉刚序言的影响。张雪岩的《编者序》写于1942年5月10日，基本断定那时他已经看到顾序。

顾序首先批评了城乡、“雅”“俗”以及“君子”“小人”的阶级陈见。^② 张雪岩论述的第二个目的也几乎用到了同样的字眼与观念。接着，顾颉刚认为近来“唤起民众”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仍旧是精英与民众的距离太大，因此要“循顺了民众的思想和兴趣，给他们以精神食粮”。顾谓其组织成立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而张雪岩也用同样的方式提到《田家半月报》。^③ 此外，顾颉刚与张雪岩都在紧接着的文字中将《田家读者自传》成功地置于这一谱系中，“这是给民众以表达意思的机会”。^④

李安宅的序没有具体日期，但他在文中转引了张雪岩征集自传的三个目的，可见成于最后。^⑤ 顾序、张序都提到民众在“抗战救国”中的重要地位，李序也强调：“农村大众是最有这种资格”去占据“抗建”历史地位的。^⑥ 针对“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只有民众自己去争取”的论点，李安宅论说到，“新史学”应该“替民众留下

① 张雪岩：《编者序》，《田家读者自传》，第22—26页。

② 顾颉刚：《序》（一），《田家读者自传》，第1—3页。

③ 同上书，第3—6页。

④ 同上书，第6页。

⑤ 杨序写成最早，序末落款是1月28日。

⑥ 李安宅：《序》（三），《田家读者自传》，第13页。

一些关于历史地位的史料”，但不应越俎代庖，而征集田家自传，“为群众争取历史地位，必无疑义”。^① 李安宅陈述的另一点，即民众的社会影响小，乃是“民众自信力与知识界对于他们的欣赏”均有限，这也直接循着张雪岩所谓征集自传的第二条目的而发。^②

这里说明三篇序言依次形成的影响，与其将之视为抄袭，毋宁解释成一种文本形成的隐含过程以及三人在共同的气氛中对民众历史地位所作的相似思考。张雪岩谓：“今后历史的动向，至少民众应与英雄豪杰平分天下。”^③此语不仅是《田家读者自传》作序者的共识，更是来自当时史学界内外又一句民史书写的宣言！如今没有更多材料能了解《田家读者自传》的销售情况，但从编者的预期来看，在农民读者以外，特别希望该书能够引起精英读书人与研究乡村建设、社会学、心理学者的注意。很可惜，从目前了解的资料看来，前述编者的预期似并未达成。

五

李安宅在序言中提到：

我们喊了乡村建设有年，这期间自然不乏明达贞坚之士，然而客观的检讨一番，不免发现一个很大的毛病。这毛病是什么？即大部分是城市人替乡村人说话，替乡村人办事，求其深入乡村，同着乡村人一起说，一起办，已算凤毛麟角。那里还有多少真正乡村人说了自己的话，办了自己的事，可以被

① 李安宅：《序》（三），《田家读者自传》，第13—14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张雪岩：《编者序》，《田家读者自传》，第25页。

承认算作乡建运动的主流呢？^①

顾、张、杨的序言都注意到近来乡村建设的效果有限，亦都分析了其中原因。不过，《田家读者自传》是否真的实现了李安宅此处所谓“乡村人说自己的话”的目标呢？

李安宅注意到美国学者托马斯等人于1918年起，根据大量农民信札、自传陆续编写的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② 在李安宅看来，这本书无疑为中国的农民史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而《田家读者自传》正是“破除代农村立言者的偏见”的“直接客观的事实”，甚至因此可能是“中国农村社会学”“贡献给世界农村社会学”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③ 顾颉刚的论述则较为谨慎：

不过，能在这里写文章的，我可以断言，决不是下层的民众。他们有享受教育的机会，有看到报纸杂志的幸运，有写文章的能力，有寄与报社发表的勇气，这都不是下层民众所具有的。^④

顾的说法颇能道出《田家读者自传》作者们的群体属性，他们能写

① 李安宅：《序》（三），《田家读者自传》，第15页。

② William Isaac Thomas and Florian Znaniecki,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Monograph of an Immigrant Group*, Charleston: BiblioBazaar, 2010, Volume 1-5. 中译本参见[美] W. I. 托马斯、[波兰] F. 兹纳涅茨基著，张友云译《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实际翻译的是Eli Zaretsky从原书选编而成的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A Classic Work in Immigration History*。当时另一本描写苏俄农村生活的著作（Karl Borders, *Village Life under the Soviets*,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27）也被翻译出版。该书同时有两个中译本，分别是陈泽生译《苏俄农村生活》，联合书店1930年版；易鸿译：《苏维埃的乡村生活》，启智书局1930年版。

③ 李安宅：《序》（三），《田家读者自传》，第15—16页。

④ 顾颉刚：《序》（一），《田家读者自传》，第6—7页。

字读报,受过教育,有投稿的勇气。不过,这批人真的就因此而“决不是下层的民众”?而下层民众真的就不具有这些素质?顾颉刚在序言中讲述了两个故事,可以视为他所理解的真正下层的典型。一是,西部各省许多人“不知道自己居住所在是某省某县,当然更不知道自己的籍贯是属于中国”,问其“贵处那里”,只会答“我是那座庙子里的”。^①另一个故事与承担塑造未来重任的乡村教师有关。有位教师不明白课本中“自从九一八以后”的“九一八”的意义,而强解为“自从一九一八以后”。^②顾颉刚的观察可谓相当重要,可以说,这些人基本处在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话语和大历史变动的直接影响之外。顾颉刚担忧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做分化的宣传”的恶果,上述观察也提供认知此后长期存在的国家认同问题的一个基因。

刘龄九在《编后的话》里表示,顾颉刚的判断是“实情”。^③这应基于他们对读者信息所作的细致分析。《田家读者自传》书前有六幅统计图,分别是:(1)“作者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比较图”,其中基督徒 63 人、非基督徒 41 人;(2)“作者职业比较图”,其中小学教师 19 人、农人 17 人、宣教事业 16 人、公务员 12 人、学生 11 人、商贩 9 人、军人 6 名、工徒 5 人、医生 5 人、无职业者 4 人;(3)“作者籍贯比较图”,其中四川 21 人、河南 21 人、陕西 9 人、湖北 9 人、湖南 8 人、贵州 6 人、云南 6 人、山东 5 人、甘肃 4 人、河北 3 人、山西 3 人、安徽 2 人、江西 2 人、江苏 2 人、广东 2 人、广西 2 人;(4)“作者年龄比较图”,其中 6—10 岁 2 人、11—15 岁 3 人、16—20 岁 15 人、21—25 岁 11 人、26—30 岁 19 人、31—35 岁 14 人、36—40 岁 12 人、41—45 岁 5 人、46—50 岁 6 人、51—55 岁 5

① 顾颉刚:《序》(一),《田家读者自传》,第 4 页。

② 同上书,第 8 页。

③ 刘龄九:《编后的话》,《田家读者自传》,第 5 页。

人、56—60岁10人、61—65岁3人、66—70岁1人；(5)“作者教育程度比较图”，其中曾受中等教育者31人、只受私塾教育者29人、受过小学教育者26人、未进过学校门者9人、受过神学教育者6人、受过高等教育者3人；(6)“作者男女比较图”，其中男性占98%，女性占2%。

经过重新统计确认，编者的统计无误。只是女性作者实际为3人，男性101人。104篇文章来自99个家庭，其中张朝宗一家6口人各自有传。所有104篇自传不完全出于作者之手，比较确定的是河南周得恩的《全家略史》。她曾倡议募捐，可是不会写倡议书，于是“和陈鸿昌同心合作”。^①周得恩可以看田家报，但无书写能力，因此她的自述应由人代写；而与她合作募捐的陈鸿昌正是书中紧随其后《一个残废者的自述》的作者。龚重义未上过学，只在教会长老帮助下识得一些字，后给执事家做长工时娶得他家“爱女”，其文由人代笔。^②

刘龄九在《编后的话》对这组统计有所解释。据他统计，其中“家庭困难者”有75人，“全书作者104人没有一人是富商地主”。他藉以推测，“田家的读者至少百分之七十是贫苦大众，真正乡下人”。^③此外，“约百分之六十曾受过中小学教育（一二年不等）”，中途休学者“百分之七十二系为穷所迫”，还有百分之十根本“未进学校之门”。^④可以认为，这百分之十未进学校之门的人的自传基本由人代写，而他们阅读田家报恐怕亦是听读或者看比较浅显的部分。不要忘了，《田家半月报》的用字取自最常用的千字以及福音书。因此，在刘龄九看来，这部自传集比较能够反映“真正乡

① 周得恩：《全家略史》，《田家读者自传》，第112页。

② 龚重义：《从死亡在线挣扎出来的我》，《田家读者自传》，第142—144页。

③ 刘龄九：《编后的话》，《田家读者自传》，第2页。

④ 同上书，第2页。

下人”的声音。

关于这6幅统计,李安宅在序言中无意提到:“作者的年龄与性别,也有很好的分布。”^①“很好的分布”,不知具体所指,年龄不必论,性别比例则差距甚大。或许与刘龄九一样,李是将自传作者与田家读者情况联系起来下的判断。张雪岩后来看到妇女教育的贫乏,打算出版专门的妇女读物,他提到:“以《田家半月报》的调查论,战前在济南出版时,妇女读者不到全数百分之二,华西情形虽较好,但仍不过百分之八。”^②幸运的是,这个数据得到1942年出版的《田家瞻望》提供的“读者男女比较图”证实。^③《田家瞻望》提供的另外几个读者数据也值得参照。(1)“读者年龄比较图”,10—15岁为10%、16—25岁37%、26—35岁35%、36—45岁24%、46—55岁21%、56—65岁8%、66—75岁5%。张雪岩据此判断,“这个资料很清楚的指明了本报的读者大部分是农村青年”。^④(2)“读者职业比较图”,农73%、教12%、商10%、政9%、医8%、工7%、传道人员6%、军5%。^⑤这一资料根据原图估算而未必精确,但比重之和远超过百分之百表明,一位医生可能同时也是农民,或一个农民可能同时也是一个小商贩。^⑥李景汉与费孝通分别对定县与江村农村人口职业的调查也说明:在职业意识并不清晰的乡村,可能一部分人非农职业者也兼有务农,“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或者因为各种原因随时在更动职业,总以更好谋生

① 李安宅:《序》(三),《田家读者自传》,第12页。

② 张雪岩:《战后教会农村文字事业应有之发展》,《基督教丛刊》第6期,1944年5月1日,第69页。

③ 其中女性读者为7.9%。参见张雪岩《田家瞻望》,第58页之次。

④ 分见张雪岩《田家瞻望》,第58页之次、第59页。

⑤ 同上书,第59页之次。

⑥ 这在自传中有很多例子,比如陈静就“历遍党、政、军、教各界”,办过夜校、做过政治教官、党部干事,但依旧身在“乡野”。参见陈静《陈静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71(2)—75(2)页。

为根本前提。^① (3) “读者教育程度”,小学 57%、中学 38%、大学 5%。^② 民国学制的屡屡变动与新旧杂糅,使得教育层次颇不容易辨识。张雪岩对统计的解释是:“一看便知受过小学教育的,占了百分之五十七。至于受过几年小学教育,则未能再加分析。入过私塾五年以内的,也放在小学的范畴里,五年以上的就放进中学范围内,至于秀才之类的老功名,及现代专门教育,则放进大学阶段中。”^③ 张雪岩把传统功名与私塾同现代教育加以对接说明,这些数据并非来自指定选项式的填写,而必然加入编者的主观认知。前引自传作者教育程度统计亦是如此,虽然相加正好 104 人,但不少作者都有先入私塾,后转入现代学校的经历。比如四川崇庆的程中立,其祖父是前清举人,因之小时候“坐牢式的读了六年经书”,后来进入高小;^④ 又如河南南阳的王伯虔,“九岁入私塾,十一岁转入教会学校”等。^⑤

大体而言,编者关于自传作者的各项统计与田家的读者情况接近。不过,这些数据尚不足以呈现自传作者的多元情况,为丰富认知,有必要了解这些自传文本更深层的生产背景。

六

首先是这些自传写作的具体地点与时间。有 57 篇自传标明写作时间或地点,其中 50 篇有具体地点,46 篇有写作时间。11 位

① 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33 年版,第 149—167 页;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0—115 页。

② 张雪岩:《田家瞻望》,第 60 页之次。

③ 同上书,第 60—61 页。

④ 程中立:《病中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 9—12 页。

⑤ 王伯虔:《蒙恩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 83 页。

老师或学生在学校写作，如小学教师林艺圃在学校办公室，杨志成在贵州威宁葛布内地会志华小学。^① 14篇自传完成于福音堂或教会组织，如白廉洁写于河南偃师蔡庄信义会福音堂，在教会工作的王乐民写于陕西澄城福音堂。^② 此外3人在军政部，苏轫轩在自己的医馆，伍岳梁在“主人店中”，杨翠堂在“沙浦村佛堂灯光下”写下他们的自传。^③ 教员吴祖泰《一个苦孩子的小史》、15岁的常鲁呆《我的小史》均完成于河南新安孤儿院，从题目的相似度和河南的大地点来看，另一位在孤儿院写作《王谨小史》的、16岁的王谨，也可能来自这个孤儿院。^④ 三位因抗战内迁到绵阳国立六中的山东籍学生，可以基本断定系相约一起投稿。^⑤ 这都体现了此次自传写作公共性的一面。当然，大多数的自传都如张厚皆一样，写于“家中”。^⑥ 由于自传按照传主出生地编排，对照落款地点和正文叙述可看到这些作者的辗转经历。例如马重生从河南尉氏逃难到陕西黄龙山，白学诚亦因战争从山西西部迁到四川金堂。^⑦ 类似因战争、求学、灾荒而跨省迁移的至少有15人。同样，写作时间亦值得注意，显示部分作者对时间与特殊日期的敏感。医生苏轫轩的落款是“中华民国复兴节纪念日”（12月25日），山西的曹新写

① 林艺圃：《林艺圃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4页；杨志成：《我的生活片段》，《田家读者自传》，第321页。

② 白廉洁：《忧患中的半生》，《田家读者自传》，第110页；王乐民：《王乐民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175页。

③ 苏轫轩：《五十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201页；伍岳梁：《我的半生》，《田家读者自传》，第243页；杨翠堂：《半生经过》，《田家读者自传》，第337页。

④ 《田家读者自传》，第95、129、134页。

⑤ 孙芹芙：《我的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288页；杨翼振：《我的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291页；于汉经：《汉经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293页。

⑥ 张厚皆：《半生经历》，《田家读者自传》，第70页。

⑦ 马重生：《浪子回头》，《田家读者自传》，第75—83页；白学诚：《我的传记》，《田家读者自传》，第261—267页。

于“一九四一年元旦节”。^① 杨翼振与于汉经相约写作,落款均为“三十年,九一八”。云南的周君友写于“二十九年阴历腊月初八日”,这天是他十九岁的生日。^② 教徒王佑民则写下“主历一九四一年三月”云云。^③

其次是这些自传篇幅与形式的差异。自传题目被分别冠以“自传”(25篇)、“自述”(15篇)、“小史”(4篇)、“小传”(4篇)、“经过”(4篇)、“几十”(7篇)、“半生”(6篇)等传记作品经常使用的题目。大部分自传都以介绍姓名、出生地、年龄开头,典型的表述如:“我姓汪名涛,字怀仁,年五十七岁,世居四川仁寿县清峰场。”^④这一模式可视为传统传记的一种延续,直接受到自传征集启事格式的影响。有十余篇自传的表述颇值得留意。常鲁呆一开始描述了他与母亲黄昏时刻等待父亲归来的场景:“一轮红日,已依西山,照着桑榆的树梢,西墙上金碧辉煌,乌鸦一对对的归巢了。这是在河南新安县的一个乡村中的一幕。”如此云云。^⑤ 孙芹芙、于汉经、白学诚亦以类似温馨的笔调开场。^⑥ 他们此时的身份均是在校学生,此类表述与其平日国文课程的习作惯性不无关系。武清林的自传,分为若干条,每条先引一句福音书,再讲述他个人对应的经历。^⑦ 武清林为教会长老,此种形式是基督教传记的典型风格。个别作者在文章中表达了他们对“自传”的看法。张楚仁一开头就提到:“山野村夫,一无所有,亦可以为传记而方世乎?”

① 曹新:《自我介绍的片段》,《田家读者自传》,第274页。

② 周君友:《我的缩影》,《田家读者自传》,第350—357页。

③ 王佑民:《我如何有今日?》,《田家读者自传》,第141页。

④ 汪怀仁:《汪怀仁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74页。

⑤ 常鲁呆:《我的小史》,《田家读者自传》,第127页。

⑥ 《田家读者自传》,第253、292、267页。

⑦ 武清林:《武清林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255—261页。吕朝阳也引福音书开头,参吕朝阳《我的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361页。

琐碎细故，恐招时讥；不过借此与读田家报的朋友，彼此介绍，一联感情而已。”他还附上一首表达其“人生哲学”的“田家座右铭”：

田何必多，深耕在勤。地不畏薄，积粪则行。既作农夫，莫苟因循。人力需剥尽，种子宜选更。旱涝及早防，教儿走正经。可以获丰益，养家身。无冻馁之忧虞，有和气之精神。六畜喂肥壮，宅物整洁精。农老云：何穷之有？^①

此铭借自刘禹锡的《陋室铭》，张楚仁是短师毕业。初中未毕业的郟郗鄂也在开头提到：

在我的阅历，好像这“自传”都是限于古今名人成功的一种经验的自述，以供后世从事伟业者之借镜。而在我这渺小、残弱、零丁孤苦的不上半世的生命历程上，既未留有光荣奇伟的史迹，供人取法，亦无处世经验告人，或影响他人之处，实无足道者，更无刊印供人浏览之价值。不过，六年之久的知交，精神之友——田家半月报，他为欲使他所有的读者朋友彼此认识、了解，藉以互慰互勉，故特发起“读者自传”，叫我们各自写出以往生活上的得失，成败的经过，好使我们互相观摹，激励，愤发努力，朝着前面胜利的人生目标迈进，故我也来参加这有意义的动作，坦白直率地写下去，以符编者的殷望。^②

他的自传观念与当时自传热潮中的普遍观念相似，而这段独白可以看成自觉呼应张雪岩等人“给民众表达机会”的目的，只是这种

① 张楚仁：《张楚仁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216—217页。

② 郟郗鄂：《孤雁零影》，《田家读者自传》，第13—14页。

自觉在 100 多位作者中甚为少见。他的自传也是其中篇幅最长的,达 36 页,两万字,花了“半个月”。他还专门为他的自传《孤雁零影》写了“自序”,上引一段即为“自序”的开头。刘登宦、王乐民、苏轫轩、易荣曾的自传也都超过 10 页。苏轫轩也为自己的《五十自述》写了“绪言”,这部自传实际是一部自编年谱,而且颇能将个人经历嵌入大历史的叙事中。^① 刘登宦则在自传中分别陈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宗教观”“教育观”。^②

整体而言,大部分自传平铺直叙,但上述这些作品却比较与众不同。这当然可以从传主有相对高层次的教育背景、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找寻原因,然此处尝试追问的是,这些相对成熟的自传的作者的写作经验。正如前引张雪岩的话,许多读者“也许不曾正式写过文章,体裁不晓,章法更说不到”,所以他要专门讲述“自传的写法”。作者写作文章的经验,对于写作自传显然会有影响,且不仅影响到自传写作的水平,还能成为其人生值得称道的部分。苏轫轩在年谱式的自传中就有一条:四十九岁,民国二十八年冬,“应田家报社征文,为撰著《我理想中的新中国》及《我怎样帮助抗战》二文,新中国一文蒙录”。^③ 作者的写作经历固然无法知道,不过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看其是否发表过文章。在过去,要博览多如牛毛的书刊简直无法想象。所幸的是,随着近代书刊电子化与数据库的逐渐完善,利用“E-考据”可以大大方便史料的检索。^④ 虽然录入信息并不完全且存在错误,但数据库提供的一定范围内的期刊

① 苏轫轩:《五十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 175—201 页。杨明远的自传也似一部年谱,参杨明远《杨明远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 12—14 页。

② 刘登宦:《五十三岁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 53—64 页。

③ 苏轫轩:《五十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 196 页。鄯郢鄂的《我理想的新中国》亦获奖。

④ 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4—65 页。

数据的基本面貌还是可靠的。通过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将这 104 位作者依次输入“全字段”检索，经过比对筛选，可以确知至少有 31 位自传作者或先或后在期刊上发表过文章（见表 2）。

表 2 《田家读者自传》作者发表文章统计

作 者	文 章 信 息	
	《田家半月报》	其 他 报 刊
林艺圃	3	
谢应檄	2	《现代农民》2
熊超凡	1	《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
杨明远		《希望月刊》1
郟郟鄞	5	
周性全	1	
周维书	8	
王伯虔	1	
吴祖泰	1	《希望月刊》2
徐建甫	7	
孙福基	2	
边殷轩		《通问报》4
李席珍	3	
马管丹	2	
常鲁呆	1	
王 谨	1	

(续表)

作者	文章信息	
	《田家半月报》	其他报刊
王佑民	3	
刘子仁	2	
苏轲轩	2	《通问报》3 《麻风季刊》1
易荣曾	33	
吴升阶	1	《通问报》2
傅明斋	1	
王道隆	1	
翁寿春	1	
张汉屏	1	
曹新		《通问报》1
刘桐山	8	《平民月刊》1 《通问报》1 《布道会刊》1
张绍诚		《合作讯》2 《益世主日报》2
王光湘	1	
白世光	3	
刘长杰	1	

注：此表据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输入作者姓名“全字段”索引筛选，见 <https://www.cnbkxy.com/>。资料截止时间为2013年3月18日。由于部分已入库的报刊残缺不全，且该库渐次充实新的报刊，因此，这份统计不甚完整，本文立说即取最低限度。

其中 27 位传主在《田家半月报》，10 位在其他刊物、7 位在两种或以上刊物发表过文章。李席珍的话可以作为一个缩影：

写作的事，我是半路出家，当然拿不出来，可是我对于文字很有兴趣，所以《信义报》《通问报》《田家报》等，我都投过多次稿子，内多关系教会新闻、地方大事，与改良风俗的道理。^①

通过该系统未检出李席珍在《通问报》的发文记录，因此该数据库搜罗并不齐全（亦不排除部分传主使用笔名发表文章）。不过，仍可据此一窥这些传主发表文章的情况。第一，发表文章的刊物类型比较一致，基本为乡村报或教会报。《通问报》《益世主日报》《希望月刊》《布道会刊》《信义报》均是清末民国重要的基督教期刊，《现代农民》《平民月刊》均是针对农村或较通俗的刊物。第二，发表内容多浅显易读。正如李席珍所言，投稿多为“教会新闻”、地方消息，而教会刊物为此类文章提供了大量空间。另外即在“问答”栏目咨询问题。第三，发表内容与作者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比如在《田家半月报》发表 7 篇文章的徐建甫，文章议题主要同其政训员的身份相关。^② 又如周维书，其在田家发表的文章多半与油桐的种植有关。^③ 发文最多的易荣曾，先后在田家发表 33 篇文章。他 14 岁参加田家组织的绘画比赛，获得第一名，这也

^① 李席珍：《我的生平》，《田家读者自传》，第 117 页。

^② 如《赶敌人》《抗战》《轰炸》《读者园地：抗战失败话逃亡》，分别参见《田家半月报》第 7 卷第 6 期、第 8 卷第 11 期、第 8 卷第 11 期、第 16 卷第 6 期。前三者是借助抗战话题的儿童游戏。

^③ 如《油桐树的用处和油桐的种法》《谈谈改良打桐油》，分别参见《田家半月报》第 6 卷第 4 期、第 6 卷第 21 期。

成为他自传中“光荣”的一页。^① 1945年他24岁时,开始在《田家半月报》“读者园地”“法律问答”“常识”等栏目撰文,但与其他读者“问答”中提问相反的是,他是答复者。或许他此时已经参与到田家的编辑中,至少也算个专栏作家。

此外,林艺圃、程中立还有编辑期刊的经历,林艺圃、苏韧轩更有撰写专书的经历。^② 撇开这些特殊经历,上述现象颇能反映当时乡村地区民众与报刊的特点:一是同构型,这与基督教期刊互相广告与发行运作有关,也与期刊对民众趣味的定位有关;二是民众阅读期刊不必只有一种,如果他们真有条件阅读的话。另外,一些读者凭借自身的见闻与相对专业的知识,在近代期刊中充当了水平并不差的作者。此种由读者而成作者甚至编者的情况,在近代期刊中亦并不鲜见。要而言之,这批自传的作者有相当部分具备独立的写作能力,少数作者更属热心写作之人。

这批自传的传主出身各异,阅读与写作能力亦参差不齐,很难被全部视为农民。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曾在其《中国乡村生活》中写到:“假如他是一个典型的村民,他就不可能到其他地方去,也不可能了解新鲜事物,因而,其言谈至死都缺少有意义的内容。”^③关于中国农民类似表述其实不少,却多是偏见,至少无意中将农民形象视为铁板一块。十余位传主皆以务农为本,而相当部分传主的生活场景皆未脱离农村,实际有着半农民的身份。顾颉刚的看法就颇值得注意,其在断言这些传主“决不是下层的民众”之后,紧接着说:

① 易荣曾:《我的小史》,《田家读者自传》,第208页。图画参见《图画第一名》,《田家半月报》第2卷第24期,1935年12月16日,第29页。

② 分见《田家读者自传》,第3—4、11、184页。

③ [美]明恩溥著,午晴、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他们正是启发下层民众的最适当的导师，为的是他们最容易和民众接近，最懂得民众所缺乏的是什么。^①

读者谷运丰（基本认定其是自传作者郟郛酆）在《田家半月报》的一篇投稿中也提到：

有人说：“田家报是为乡下的农人写的，为甚么农人看的少，反而城市中人看的多呢？”是的，就把我介绍的代订簿存根翻一下，确是如此。直接是农人订阅的不及十分之一。这岂不是失掉了该报的意义吗？^②

这种直观感受比前引统计更为贴切。但无论实际阅读的农民有多少，谷运丰在文章中重点提到与他一样的“城市中人”看田家报的意义：联络城乡，发挥启迪引导基层农民的重要作用。顾颉刚用“乡村里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来称呼这些“读到田家报的，能写自传投寄”的人。^③这与孙恩三在阐述《田家半月报》的读者对象时用词不谋而合，即“乡村知识人”。

在科举制废除前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地方乡绅承担着基层社区管理的主要责任。在下层绅士外，也存在读过书而并没有取得功名的人。这批人及地方乡绅可称为“乡村读书人”，他们都与乡村保持非常密切的关联，有些甚至就是农民。^④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读书人与乡村的关系逐渐疏离，并加剧了乡村的衰落。费

① 顾颉刚：《序》（一），《田家读者自传》，第7页。

② 谷运丰：《我们为甚么要看田家报？》，《田家读者自传》第8卷第15、16期合刊，1941年8月1日，第12页。

③ 顾颉刚：《序》（一），《田家读者自传》，第8页。

④ 张仲礼著，李荣昌等译：《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上编论述尤多。

孝通就注意到：“在新式教育中一方面不能供给人民一般所需的文字知识，一方面却夺走了一乡的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而想复兴农村是在做梦。”^①与此同时，伴随乡绅的消逝，过去基层社区的管理职能被越来越深入的现代治理机构所分割。《田家读者自传》显示，40年代初的乡村，仍有部分读过书而没能脱离乡村的人，凭借其教育经历（部分还是自觉地）发挥着过去乡绅的部分作用（尽管其作用已远不及乡绅），或至少还被一些人视为维系乡村秩序的重要力量。

七

对《田家读者自传》作为史料的生命史作出考察后，此处就史料内容再稍作申说。由于104篇自传出自不同人的手笔，其呈现的个体生命历程及可供讨论的内容颇为繁杂。研究者若无明确的问题意识，则很难对传记内容作统摄性的叙述。这本自传可供回应或挖掘的议题较为丰富，本文则特别关注如下问题，即自传作为一种写作行为，在平铺直叙传主人生经历的同时，作者如何塑造和认知自我形象？超过半数的基督徒作者，如何表述自己归主的历程与信仰？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提示大众文化的研究要关注“那些目不识丁、半文盲或粗通文墨的人群，看他们怎样用自己熟知的文化形式得心应手地表达自己”。^②达恩顿的告诫，基本是人类学“他者的眼光”。借此，论者不必以某种预设的农民形象

^① 费孝通：《江村通讯：格格不入的学校教育制度》（1936年7月10日），《江村经济》，第238页。

^② 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从中抽取材料加以说明。这本自传，恰是一份历史学家考察“他者”自我意识的重要材料。

除前述对“自传”本身的理解外，不少读者对自传写作行为都有比较明确的自觉意识。一些读者都会在结束前如白廉洁一样写道：“现在我的生活，仍然和困苦争战，这就是我的自传吧！”^①吴祖泰在文末说：“话拉拉杂杂的说了不少，可是没意思，没价值，不通顺，不再说了。”^②曹新与李官春都对自己写作的文章是否为自传，表达了不自信：“这篇东西，不能算是传记吧。”“我少读书，字不知如何写，言不知高低，请不要见笑！”^③从前述《田家读者自传》作者发表文章的统计推想，这次自传写作大致应是他们几人难得的正式写作经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苏轫轩明确表达自己借助自传“欲存我清白不朽之精神于万世，实我垂留不灭之永生”之立言的“微意”。^④

不少作者都在自传中讲述了自己阅读《田家半月报》的经历，并不约而同表示“获益”很多，内中一些还是田家报的介绍人。刘俊立表示“田家报是确实替农民说话”。^⑤王道隆亦说田家报“编辑日臻完善，增人知识不少”，他因此呼吁读者响应当年田家报的“五万运动”。^⑥赵瑄在文末称赞田家“诚国内最佳最廉之农友读物也”，并“敬献数语”。^⑦无论这些作者是否有意在文中安排这些赞词，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为田家报提供了最直接的广告。边

① 白廉洁：《忧患中的半生》，《田家读者自传》，第109—110页。

② 吴祖泰：《一个苦孩子的小史》，《田家读者自传》，第95页。

③ 曹新：《自我介绍的片段》，《田家读者自传》，第271页；李官春：《五十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316页。

④ 苏轫轩：《五十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176页。

⑤ 刘俊立：《为善最乐》，《田家读者自传》，第120页。

⑥ 王道隆：《王道隆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228页。

⑦ 赵瑄：《三十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301页。

殷轩在自传中提到,他“努力介绍田家报,已介绍数十份,我已读田家报三年,因而将我经过的一切写成了自传”。^①这种将田家报与自传写作联系起来的表述,很可以看成自传作者自觉的写作策略,即以此获得入选出版的更大可能性。而编者选入迎合刊物需求的自传,何乐不为?

不少作者也借自传写作的机会,表达“私意”。陈鸿昌是残疾人,选择自学中医,替人“义务治病”。由于“看的书不多,又不会动,不能和高明的医师接谈聆教”,所以“深感学不敷用”,所以他希望同道们能惠其医书或者妙方。^②家贫的李松林在文中表达了升学的愿望,以自叹“妄想”结束自传。^③王光湘也有同样的困境,不过他却比较直接地在自传中写到:“余今已二十一岁矣,对读书一事,还希向上,不过碍于金钱耳。若田家半月报奖学金募成,决要求该报助我上进,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大愿望。”^④前述田家社在1941年的三项新希望无一实现(读者自传未按期出版,五万运动目标亦未达到),因此并不清楚王光湘是否如愿获得田家奖学金。不过,作者借助自传表达愿望不失为一种聪明做法。

同样,将读者自传“介绍全国民众”的可能,使得有意识的作者当然不愿意放弃自我形象塑造的机会。林艺圃在自传中特别表现自己努力做“乡村运动者”的形象;堪称才思敏捷的郗郗酆,引到了梁启超的话;^⑤程中立发表了对时局的议论,并称四年中“国内外局势的演变,大都不出我的意料;出人意料的,要算是汪精卫的出走。此外我最忧虑的,莫过于国内军政的不统一,和地方恶劣

① 边殷轩:《我是主的肢体》,《田家读者自传》,第111页。

② 陈鸿昌:《一个残废者的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114页。

③ 李松林:《我的生活的片段》,《田家读者自传》,第313页。

④ 王光湘:《王光湘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323页。

⑤ 郗郗酆:《孤雁零影》,《田家读者自传》,第48页。

风气顽固潜势力的阻碍新政的推行”。^①

前述现象在在表明，在部分乡村读书人笔下，自传已不是单纯的自传，除带有一般自传的自我表现的特征外，^②也体现了此次通过征文书写自传的另一种公众性与更加丰富的写作策略。

《田家读者自传》104篇自传中，有63人为基督教徒，他们的自传是了解教徒生命史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一份难得史料。《征求读者履历》的启事中，第七条为“信什么宗教？（如果你信基督教请写明属哪一公会）”。在编者眼中，了解教徒所属教派当然非常必要，因为不同公会的传教策略与定位存在差别，甚至影响到教义的解释。不过，63位教徒并非每人都表明了自己的教派，明确提到的仅有8位：张启新、吴升阶属路德会；王佑民、王乐民属瑞华会，他们写作时同在陕西澄城；李荫棣、聂光汉属循道公会；杨志成、吕朝阳属内地会。通过落款可知白廉洁属信义会，刘桐山属神召会，刘长杰属圣公会。^③这间接反映出多数教徒教派意识淡薄。

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被公认为现代自传的起源。有论者指出，自传与基督徒通过反省以求忏悔的行为密切相关，自传写作也因此成为追问自我的行为。^④这种精神也见于《田家读者自传》，吕朝阳即谓：

看到《田家半月报》的征求读者自传的启事，有些时候想

① 程中立：《病中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11—12页。

② 参见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思与言》第34卷第3期，1996年9月，第152—153页。

③ 通过梳理各教派传教史料，或许可以厘清其他作者所属的教派。比如，杨志成所在的志华小学就是当时内地会的主要传播地，而另一位自传作者朱德新，他来自距此不远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应属循道公会。

④ Linda Anderson, *Autobiogra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8—19.

写点关于自己的事,心里很想把自己说得很体面,但是又觉得自己吹自己,无奈太可笑了。但现在我忽然又写自传了,其动机完全在传前的两节圣经。^①

他所引述两节分别是:《加拉太书》第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歌林多后书》第11章30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于我软弱的事便了。”可谓相当敏锐地捕捉到基督信仰的自传精神。作为宣教策略的一种,类似的自传也被不断登载于近代书刊中。大量自传被冠以“见证”的题目,讲述教徒被救赎的历程。^②从题目也可以看到《田家读者自传》的基督徒们受此类写作或日常基督精神的熏染,如王伯虔《蒙恩自述》、边殷轩《我是主的肢体》、张灵生《我怎样信教的?》等等。^③不惟如此,几乎每位教徒都在自传中讲述了归主历程,这为了解他们信仰的转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材料。

郅郅鄩用“走上人生新阶段”一节讲述自己归主的经历。^④否定过去的自己,是基督徒自传的特征。川合康三就注意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描写“从埋首俗尘的我,到信仰上帝的我,这一自我转换,是他写作自传的动机,也是他自传的内容”。^⑤自传作者张灵生也意识到这一特征,其言:“阅报得知征求读者自传,特将我的旧时生活,与怎样信教,都说明了,惟愿神,作我时常的领导者,使

① 吕朝阳:《我的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361页。

② 例如康淑廉《一个女孩的见证》,《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第10页。

③ 他如刘俊立《为善最乐》、成悟生《我的自省》、王佑民《我如何有今日?》、翁寿春《证恩小传》、高易名《我怎样作了基督徒?》、王志昌《我是个牧羊人》。

④ 郅郅鄩:《孤雁零影》,《田家读者自传》,第25—26页。

⑤ [日]川合康三著,蔡毅译:《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我能为他多作见证，引人归向主，荣耀神。”^①其他作者虽不如张自觉，所言却不出此意。刘桐山即表示，“自从得真道以后，才知过去错误”。^②丁在行亦谓：“幸遇良机得信从前所反对之耶稣，方知自己所犯罪恶，并不次于他人，从此弃商，献身为主。”^③不过，自传中的忏悔是在成为教徒一定时间后的事，并不必然表示当初就诚心或带着忏悔之心入教。马重生即是一例，他曾参加过民间宗教金丹道，视基督信仰为“异端洋教”，但后来走投无路，“人穷呼天，就不顾一切了，便勉强走进栏下听道”，由此成了基督教徒。^④白廉洁自陈“信主之原始”，是祈祷基督“保护我家无事”而“应验”。^⑤刘子清因违禁偷吸鸦片，“无处藏躲，闻听耶稣能救人”，在教会的戒烟厅戒烟并成为信徒。^⑥这种现象充分证明，信教民众很容易用固有的信仰观念来对待基督宗教这样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⑦而这恰也为基督宗教的传教事业提供一种机会，而不必出现强有力的宗教间的冲突。朱永恒、傅明斋就讲述了在传道员的影响下自己或家庭从观音崇拜转为基督信仰的过程，蔡启光也从小和尚成为基督徒。^⑧

苏轲轩、伍岳梁也从佛教信仰转为基督信仰，他们的表述非常值得注意。伍岳梁的父母系佛教徒，故谓“迷信难免”，并对家庭

① 张灵生：《我怎样信的教？》，《田家读者自传》，第236页。

② 刘桐山：《刘桐山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277页。

③ 丁在行：《丁在行小传》，《田家读者自传》，第365页。

④ 马重生：《浪子回头》，《田家读者自传》，第77(2)—79(2)页。

⑤ 白廉洁：《忧患中的半生》，《田家读者自传》，第109页。

⑥ 刘子清：《一生的历史》，《田家读者自传》，第148页。

⑦ 这方面的系统论述参见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⑧ 朱永恒：《我的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155页；傅明斋：《傅明斋自传》，第225页；蔡启光：《一个贫苦的孩子》，第376页。

产生抵触情绪。^①正如伍岳梁所谓,中国旧有信仰的偶像崇拜,在基督教看来是迷信的表现。不过,从自传作者的陈述可见,基督信仰本身也可能被贴上“迷信”的标签。刘龄九在《编后的话》中就提到:“这种福音,这种精神,是否迷信?是否为我们中华民族今日所必需?愿国内明达之士肯虚心的想一想。”^②言语之中,正传达一种无奈。这在普通的基督徒身上,表现得更为直接。梁魁三因为妻子信基督教,自己“有机会听道理学唱诗,一般朋友讥消我随了迷信”。^③刘永生则因为当地“信主者无一人,以畏人毁谤,抵抗力薄弱,不敢认主,今则坚决的打倒迷信,悔罪认主”。^④张汉屏表示:“有信仰基督的心愿,但因种种关系,未能正式加入教会,这是极可惜的。”而他所谓的种种关系,无非“世代相传的宗教,是烧香敬神,崇拜偶像,而目下此种旧俗,各村仍然盛行”。^⑤朱明春信主后,“时受逼迫,屡遭凌辱,族党双亲皆未信主,多方与我为难”,双亲过世后,族亲依旧称其“迷信”而阻拦。^⑥

除旧有信仰,现代政治与科学也可能视基督信仰为“迷信”。苏轫轩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加入基督教。据他称:

在党人方面,视我是“迷信”为“腐化”,是不合科学精神,应除党籍。在教友方面,视我是“重世”,为“肉徒”,是不顾灵魂得救,应革教名。双方逼迫,不表同情,亲友疏离,社会轻

① 伍岳梁:《我的半生》,《田家读者自传》,第237页。

② 刘龄九:《编后的话》,《田家读者自传》,第4页。

③ 梁魁三:《一生思想转变的经过》,《田家读者自传》,第309页。

④ 刘永生:《我的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280页。

⑤ 张汉屏:《我的小传》,《田家读者自传》,第251页。

⑥ 朱明春:《我的一点感想》,《田家读者自传》,第254页。

视，更兼恶魔施虐，陷我败亡。领洗月余，长女暴亡，以及全家染疫，长子罹残，街市遽变，财产尽倾，社会人士，冷笑热嘲，有谓放佛遭谴，应受横祸，总总讪谤，不一而足。^①

基督教信仰已经深度影响其社交与生命状态。与之相反的是，一些作者对基督信仰与其他信仰的“兼容”。程中立立即谓：“家庭的人虽已破除迷信，但仍设有牌位，纪念祖先。对孔孟、总理、委座和耶稣的精神，都很信仰。”^②虽然政治理念与宗教信仰并不矛盾，但苏轫轩的例子表明两者很容易成为互相攻击的对象。另一些作者也用“信仰”指称儒、释、道、耶以及三民主义。汪怀仁即表示：“信仰儒释道耶，知儒教要尽性知命，释教要不染世累，道教要静养此身，耶教要守一无二。”^③日新子也自陈：“信仰孔孟圣贤之学，及三民主义。”^④不过，仔细辨认便发现，他们所谓的“信仰”并不能与基督信仰并论，因为他们都不是基督教徒，或许只是表达一种认同之意。这里提示着，如果程中立等人所谓的“信仰”还显得比较传统的话，那么作为制度性宗教的基督宗教对中国教徒的信仰世界及“信仰”本身含义的改变可能并不小，尽管部分教徒可能出于功利目的入教。

如果从基督信仰的角度再看《田家读者自传》，会发现另一有趣的现象。每篇自传结束后还有空白，编者会插入一段语录。这些语录来自儒家经典、学者名言、俗谚以及基督经典。^⑤这种语录经常出现在书报或日记本的角落，用以补白或修身，本不足为奇。

① 苏轫轩：《五十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185—186页。

② 程中立：《病中自述》，《田家读者自传》，第9页。

③ 汪怀仁：《汪怀仁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74页。

④ 日新子：《杨日新子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75页。

⑤ 分见《田家读者自传》，第78、274、304、314、318、332、349、360、373、378页。

儒耶混杂,则表明与《田家半月报》类似,编辑试图呈现田家的包容性。这种包容绝非放弃宣教,也不表明信仰的多元,而应视为“基督教本色化”的策略之一。

自传往往被视作个人的历史。但《田家读者自传》的作者们超出当时“自传写法”及自传理论的一般认识,借此或许是其一生唯一正式写作或留名的机会,表达了个人的希望或志愿。这些志愿并不限于私意,亦多涉家国天下。59岁的马重生盼望“田家的青年读者”,“在学校中努力求学,尽心用功,习成了建国治世的身手,以备出身使用”。^①13岁的张万庶与19岁的张万仁兄弟表达了“服务人群”“抗战杀敌”的愿望。^②梁静轩表示:“立定志愿在抗战建国之时,尽力服务社会,兴办地方公益,以尽国民天职。”^③这些志愿看起来比较空洞,却体现“抗战建国”的口号对民众意识的形塑,是对大历史的一种呼应。而这些作者基本是教徒。陈静的话颇能作为这种基督精神的诠释:

栖栖遑遑,奔走半生,历遍党、政、军、教各界,深知人心险恶,社会之争夺盗窃迄无净土,乡村中抢劫暗杀无虚夜。使乡村民众终岁不得安居乐业,实系人心无所归宿所致。从此看来,欲改正风俗,必须挽救人心;欲挽救人心,必须令人心有所归宿;欲令人心有所归宿,非由基督建设其心理别无二法。故予不辞牺牲一切,甘愿置身教育,以便宣传法美意良的基督

① 马重生:《浪子回头》,《田家读者自传》,第77(2)页。

② 张万庶:《我的愿望》、张万仁:《我愿快长大去打敌人》,《田家读者自传》,第68页。

③ 梁静轩:《梁静轩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115页。

教，恪尽基督信徒之天职。^①

时过境迁，这些愿望又是否达成？

结 语

视野所及，104位自传作者，只有杨志成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留下名字。^②连这些作者接触过的人，亦鲜有出现于既有的现代史书写中者。比如聂光灵在成都结识林则(A. W. Lindsay)，后者为中国现代牙科医学之父。^③《田家读者自传》问世后，似并未受到多少关注。当时最小的作者，即便健在，也年逾九旬。否则可以通过口述了解更有意思的问题。

虽然存在诸多遗憾，《田家读者自传》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书写的真实一面。民史书写虽然早已成为史学界内外的共同期许，然却很难说已走向深入，甚或不时沦为达到民史以外的目的的奴隶。正是在此意义上，《田家读者自传》额外值得珍视。

本文最后申说两点：第一，与其他民俗材料、大众生活史材料类似，这个文本尽管合而为一集，却更多地表现出琐碎的特征。读者对此一文本特征应有高度自觉，不必由此推知当时整个中国农民(乡村读书人)的境况；第二，这批作者大多属于文中提到的乡村读书人，他们或多或少接受过一些正规教育，却不能因此否认其

① 陈静：《陈静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75(2)页。

② 杨写作自传时是贵州葛布内地教会志华小学校董，后成为基督教葛布教会首任牧师。可参见《基督教葛布教会百年史》编写组《基督教葛布教会(1904—2004)》(内部发行)，<http://shimenkan.org.cn/info/gh/#20>，2021年3月13日。

③ 聂光灵：《我的自传》，《田家读者自传》，第331—332页。

与农村存在的密切联系。通过自传,可以看到他们写作中的主动与智慧,也可以看到这批乡村读书人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至今日,这种乡村读书人依然数量庞大,他们处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是维系未来社会趋向良善的重要分子。